

污水处理厂建起来了，为什么污水仍直排黄河

黄河中上游部分欠发达地区管建不管运行，有的污水处理厂沦为化粪池

建有污水处理厂，依旧有不少污水直排，最终汇入黄河；由于运行成本高，有的污水处理站无奈“沉睡”，甚至“沦为”化粪池。
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日沿黄河中上游走访多个欠发达地区发现，由于基础建设跟不上、设备运行状况差、日常运行成本高，导致不少地区“建了污水处理厂、污水依旧处理难”。

有处理厂却仍有污水直排，黄河中上游治污依旧是难题

多方投资建起污水处理厂，由于处理能力不足、效率不高、覆盖面有限，污水依旧难以“全收集、全处理”。部分居民生活污水只能直排，最终汇入黄河，这是记者在黄河中上游流域走访时的见闻。

在黄河中游一个县，境内有一条黄河一级支流穿过。当地环保部门干部介绍，近年来由于加强监管，工业废水基本都达标排放，目前主要的污染来自农村生活污水。为此，当地在远离县城的乡镇建了两座小型污水处理站，但运行状况均不尽如人意。

记者来到建有小型污水处理站的一个乡镇河岸边看到，很多居民生活污水通过管道直接排入河道中。有的管道破损，污水就直接沿着河坝流到河床上，将砖墙染成黑色。

当地环保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，虽然2018年在市、县级财政的支持下，这个乡镇新建了一座污水处理站，但配套管网建设成本太高，目前只能收集全镇接近一半人口的生活污水，实际处理能力只达到设计能力的一半。

为此，这个县城建部门在当地沿河岸修建了20个储水罐，临时收集居民生活污水，再通过污水收集车集中拉运至就近的污水处理站处理。有工作人员坦言，“处理站处理能力有限，水泵等设备也经常出现问题，很多时候来不及拉运，储水罐污水溢出，也造成污水直接流入河道。”

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地处三江源地区，紧邻黄河源头。记者在甘德县污水处理厂看到，常规露天的污水曝气池，却安置在一个钢棚房内。走进钢棚房内，明显感觉室内温度提升。

“没办法，这边气温低，处理污水的微生物容易被冻死，只能将曝气池装在室内，烧锅炉保暖。”污水处理厂相关负责人说，甘德县污水处理厂海拔4000多米，冬季气温低，必须通过外层钢棚房和内部烧锅炉来保暖。

“每年仅锅炉烧煤费用就要25万元左右，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”这位负责人说，青藏高原地广人稀、昼夜温差大，导致污水处理难度大、建设和运行成本高。



甘德县污水处理厂，污水曝气池安置在一个钢棚房内（2020年9月11日摄）。

本报记者李占轶摄

更加紧迫的是，总投资两千多万元建成的甘德县污水处理厂，主要处理县城居民小区、办公楼和商铺的生活污水。目前每天处理量1200吨，已满负荷运转，急需扩容提升处理能力。

建设运行成本高负担重，有的污水处理厂停运沦为化粪池

记者走访发现，当前黄河中上游流域部分欠发达地区“有污水处理厂、依旧污水处理难”的主要原因，是收集污水管网建设成本高、污水处理运行负担重。尤其是不少欠发达县域，刚刚脱贫摘帽，自身财力有限，难以承担污水“全收集、全处理”的建设、运行费用。

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，十多年前县城没有污水处理厂，生活污水是经过化粪池处理后直排黄河。近年来，随着污水处理厂和管网的建成完善，目前城区85%以上的污水都能收

集，但在城乡接合部等区域依旧难以全覆盖。

“管网建设费用大约为每公里100万元，尤其是老城区存在管网老化、雨污混流问题，布设新管网的费用十分高昂。”永靖县住建局干部王晓明介绍。

随着城镇化加速、易地扶贫搬迁，县城和城镇居民增多，污水排放量增加，污水处理厂也必须扩容。尽管地方财力有限，但在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下，“欠账”扩容污水处理厂成为不少欠发达地区普遍的选择。

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新民污水处理厂厂长高春成介绍，由于移居城镇居住的人口增多，原来的设备处理能力滞后，因此2020年对现有污水处理厂完成了扩容改造，“虽然当时改造资金严重不足，也只能先动工，钱以后再想办法”。

与此同时，黄河中上游流域欠发达地区由于人口密度相对低，污水浓度较低，加上低

温等因素影响，污水处理成本远高于东部发达地区。一些污水处理厂保障正常运转，还得每天固定投入葡萄糖。

永靖县盐锅峡镇污水处理厂厂长李树坤说，镇区人口少，污水厂来水主要靠居民生活用水。进水COD浓度低，导致微生物处理污水时碳源不足，只能通过添加葡萄糖确保微生物不被“饿死”，“每月得添加三四吨葡萄糖，直接抬高了处理成本”。

记者采访了解到，目前青海省共有14个县城污水处理厂处于高海拔地区，普遍存在污水浓度不高，处理效率不高，收集率不高、雨污分流不够等问题。加上三江源地区冬季气温低，给污水处理工艺带来很大挑战，普遍需要加温棚、供暖气，有的污水处理吨水成本高达每吨4元。

在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，因无力承担后续运行费用，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不

得不停运。信义镇副镇长王三牛介绍，污水处理厂建成后，各级政府并没有跟进保障运行资金，镇政府独自难以承担这笔费用。

“有的污水处理厂建成时间早，处理后的污水难以达到现有的排放标准，没有资金进行设备升级，现在只能当做化粪池使用。”王三牛坦言。

污水处理不能“管建设不管运行”

建设有上级资金投入，运行全靠本级财政投入保障，高昂的污水处理厂运营成本，让不少污水处理厂“不堪重负”。2020年4月脱贫摘帽的青海省甘德县，2019年县级财政收入为1674万元。县里每年支付污水处理费用要150万元，占2019年本级财政收入比重接近十分之一。

一些基层受访人士呼吁，不少刚摘帽的欠发达地区，都处于生态脆弱区域，生态环保压力大，地方财政运转紧张。鉴于这些地区财政实际情况，污水处理厂建设配套、日常运行等都需要国家政策支持。

一方面，污水处理厂自身建设投资就在一两千元，地方仅配套资金就要200万元至400万元，只能使用地方财政收入开支，很多时候地方只能拖欠。建议国家下调这些欠发达、发展受限制区域的资金配套比例，便于相关污水处理、收集项目的扩能建设。另一方面，很多欠发达地区城镇化仍然处于起步阶段，不少区域尚未建立起自来水、垃圾处理、生活污水收费机制，污水处理运行费用完全压在地方政府支出上，因此也无法采用PPP模式进行建设。迫切希望改变国家专项经费“管建不管运行”的情况，给予一定运营经费补助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。

完善污水直排及时发现、及时收集、及时处理机制，也是当前急需补上的短板。山西省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临县分局副局长高国平等干部建议，全面排查排污口，在重点区域安装视频监控设备，并利用无人机拍摄等手段实时监控，同时坚持科技手段与人工手段结合，加大人工巡查力度，确保生活污水经过相应处理，杜绝直排、偷排。

“对于没有工业企业、离市区管网较近的乡镇，产生的农村生活污水有限，建议采取分散建设蓄水池的方式，通过集中拉运处理，降低处理成本。”甘肃省天水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汪朝波建议。

（本报记者吕梦琦、解园、李劲峰、李占轶、张玉洁）

“一把手”变“一霸手”，警示对权力的监督不能失效



坏不重要，与杨宏伟的关系好才重要。”办案人员说。

在杨宏伟离开黔江后，该区70余名处级干部因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查处，其违纪违法行为大多发生于杨宏伟在黔江主政期间。

“一把手”腐化堕落，监督失效是重要原因。上级监督太远、同级监督太软、下级监督太难，使得对“一把手”权力监督制约的效能弱化，公权极易沦为个人的私器。

吉林省人防系统腐败问题，就是人防部门“一把手”权力过于集中的典型案例。专项整治以来，该省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人防系统干部368人，涉及人防部门原职或现职“一把手”就有76人。

“一把手”违纪违法问题一再验证“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”。

目前，主要领导干部不直接分管具体事务的制度，已在一些地方陆续尝试并推行。能否从制度上破解“一把手”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，需要实践的检验。

治家不严“后院”失火

对亲属子女的失管失教，是很多领导干部走向堕落的开始。正确的权力观，是党员干部保持本色的“护身符”，尤其是手握重权的“一把手”，如果萌生了“封妻荫子”思想，权力就会在利益面前变质、底线就会在亲情面前失守。

在1月份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14名中管干部及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、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中，就有8人被提到有家风问题，“对家人失管失教”。

1月热播的反腐纪录片《正风反腐就在身边》，透视了官员贪腐中“父子兵”“夫妻档”等现象。

曾先后担任山西省临汾、运城、晋城三个市“一把手”的张茂才，其案件最大的特点就可概括为“全家齐上阵，贪污父子兵”。张茂才常年不在家，总觉得“亏欠他们”，面对叛逆的小儿子张轩拿着菜刀和他干仗，都没有认真管教，反而一味纵容。

因此，有群众称有些“一把手”为“一霸手”。

“一把手”在选用用人上搞“小圈子”，凭借个人喜好，往往导致站队式、抱团式腐败。

重庆市黔江区委书记杨宏伟的“双开”通报指出，他是“任职地区政治生态的最大‘污染源’”。杨宏伟爱好打篮球，跟他一起打球的能得到重用，他身边的同学、老乡、裙带关系、旧部也常常被破格提拔安置。“工作干得好与



“力惩” 新华社发 崔莹作

事的名声传扬在外。连张茂才的大儿子也开始和张轩攀比，“看谁用父亲的权力赚钱多”。

类似案件近年来并非罕见。曾经引发舆论风暴的“严书记女儿”事件中，四川省广安市委原副书记严春风在舆论迅猛发展时，一心急于灭火，希望找熟人通过私人关系平息事件。

幼儿园风波发生仅一周之后，四川省纪委监委在初核的基础上，宣布对严春风进行立案审查调查，并发现了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、受贿等问题。

面对镜头，严春风悔过：“愧对我的家人，我的儿子没有父亲，我的女儿也没有父亲。”他平时很少拿出时间陪伴孩子，却错误地想从金钱方面来弥补，甚至不惜违纪违法来满足就前妻的经济诉求。

“恋亲不为亲徇私，念旧不为旧谋利，济亲不为亲撑腰”，领导干部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，筑牢家庭防线，一方面要对家人关爱不

溺爱、善待不纵容，另一方面，也要严守纪律，认真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。

每年岁末，这项填报工作都在进行，这是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忠诚老实的重要一关，也是依靠制度帮领导干部守好廉洁底线的重要内容，起到了抓早抓小、防止带病提拔的作用。

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月份发布的“双开”的干部名单里，就有多人存在“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”“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”问题。有的人心存侥幸，认为“不报告也无所谓，少报了组织也发现不了”，更有心虚者害怕组织核查，对本人婚姻状况、配偶子女状况故意含糊遮掩，这都是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表现。

保留死刑对贪腐“零容忍”

1月29日，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

依照法定程序，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“一把手”赖小民执行了死刑。他是十八大后因贪腐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的第二名官员，也是受贿金额最高的高官。

刑法对于受贿罪最高“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”的规定，对心存“杂念”的干部有多少震慑作用？

事实上，贪腐犯罪是否判处死刑，是在不涉及命案的前提下，除了考虑涉案金额，更要看造成的后果，是否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，是否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，造成恶劣影响等。

即便赖小民在开庭时曾当庭认罪、悔罪；又比如判决书也认定，他曾提供下属人员重大犯罪线索并经查证属实，具有重大立功表现。但这些情节，依旧不足以让赖小民死里逃生。支撑着这份判决书的，不是对贪官“杀之而后快”的义愤，而是全面评价案件事实的理性、冷静与客观。

在司法实践中，对腐败犯罪数额过亿的贪官判处死刑已有判例。

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、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、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等人，因受贿罪被判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这些判例均凸显党和国家对腐败犯罪的零容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，对当前反腐败形势作出重要判断：“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，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。”

比如“高利转贷罪”，一边合法贷款、一边非法放高利贷；“一家两制”式腐败，即家中既有在党政机关工作的领导干部，又有非公有制经济部门、民营企业等领域从业者；“公款存储”问题，利用财政资金为金融机构冲业绩、获取超额利润……

贪腐手段在不断翻新，纪检监察队伍也必须更新知识结构，不断提高识别和破获新型腐败案件的能力，维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，彰显党和国家对腐败行为的“零容忍”。

（资料来源：新华社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、中国纪检监察报等）